

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道德重塑

李建立 李东方 王红玲 著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道德重塑

李建立 李东方 王红玲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道德重塑 / 李建立，李东方，王红玲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 - 7 - 81112 - 530 - 6

I. 经… II. ①李… ②李… ③王… III.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F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9903 号

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道德重塑

李建立 李东方 王红玲 著

策划编辑：蔡红华

责任编辑：刘焰

封面设计：孟涛涛

责任校对：段建堂 解彩群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1.625

字 数：601 千

版 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1112 - 530 - 6

定 价：56.00 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内 容 提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它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亦即《资本论》第一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自己新的生存论基础。经济现实与传统伦理之间的矛盾张力突出了社会主义市场实践的伦理新境遇，而这正是我们关于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研究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研究。

在理论要点上，我们突出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发问方式，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社会贫困问题为出发点，从“人”的角度向市场发问，由真理原则引出道德原则，由经济规律引出道德规律，即马克思通过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从商品经济规律引出市场契约伦理，从人道主义角度引出市场伦理困境，在自由、诚实和公正的经济学研究中，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托起契约伦理与劳动正义，在资本的非人化趋势中发现资本的人道化趋势，把古典经济学的契约交换和劳动正义改造成无产阶级的劳动权利呼吁，并由劳动权利进一步要求人的权利。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突出马克思的生命哲学及其生命释义方法，把世界的“创造”即解释看作是一种理性和情感参半的思想活动，强调哲学和科学活动存在伦理前提，认为经济规律因其不可直接观察、只能以抽象力来把握的固有属性而使其带上某种形而上学性质，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得以在经济学世界观建构过程中以经济规律来寄托不同的道德情感。所以，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学世界观的技术化或操作化的表达方式，被马克思称作“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

而经济学世界之形而上学性质的根源来自于马克思以“生物学范式”整理经济世界，强调事物的内在秩序和内在价值，在本体论上以“有机整体”的思考方式肯定事物自身的“生存权利”；在认识论上突出事物的“内在秩序”的不可直接观察、只能理性把握的形而上学性质；在价值观上，强调伦理和法理只是事物本质的宣告和理想化的反思影像，亦即，事物的本质就是道德实体，而法律旨在保护伦理关系、实施伦理秩序。法理的基础是道德，道德的基础是事物的本质。这在经济学研究中反映出来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秩序规定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表现为马克思对古典

经济学世界观的理论再造与道德重塑，他既承认现存世界的生存权利及其在伦理与法理上的自我辩护，又从经济进化中得出现存秩序及其伦理与法理要求的历史性，从社会历史的“原始方程式”中逻辑地推出通往未来理想的人道社会的理论通道和现实途径。

在篇章结构上，本文采取三篇结构，突出马克思价值—认知结构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马克思早期思想不是需要摆脱的消极负能量，而是其理解世界的一种积极的“前结构”，这种“前结构”作为一种内在的、基础性的和连续发展的、使知识和道德成为可能的价值—认知结构，规约着马克思以后思想发展的路径和方向，以至连马克思本人也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第一篇“前经济伦理批判时期”突出自由、幸福和契约正义为理论内核的原子论哲学的自然法框架，及其在解答社会贫困这一时代课题过程中，如何被政治学化和法学化为一种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为中心的“有机理性”和“民主制”理想；第二篇“经济伦理的经济哲学批判时期”突出马克思以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而将人道主义与经济学、经济规律与伦理规律予以深层学理融合所演化出的唯物史观的核心框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规律载起人道主义；第三篇“经济伦理的经济学批判时期”则是唯物史观的经济学化过程，从商品—货币的形式规定和交换规律引出契约伦理与经济人的德性要求；这种契约伦理在生产领域的贯彻使得劳动价值论被“彻底化”为剩余价值规律，从而扭转了劳动价值论的伦理方向，使等价交换、契约伦理和劳动正义成为无产阶级的伦理武器，指出经济规律的人道主义的进化方向，从而要求共产主义公平，即，超越平等主义的劳动权利，视真正的人的权利应该是考虑个体差异的不平等权利。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篇 前经济伦理批判时期		
(从“中学毕业作文”到《德法年鉴》)	(36)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学生时代的生命追问		
——从新教价值观到自由本体论	(38)	
一、人性自由与人类幸福：一个寻求与自然（基督）一致的		
少年新教徒	(38)	
(一) 自由与责任、权威与理性：人兽自然分野下的		
自由人性设定	(40)	
(二) 自由与决定、使命与痛苦：社会原则、肉体原则与		
精神原则	(41)	
(三) 完美境地：个人尊严、人类幸福和自身完美	(42)	
(四) 救赎之路：世俗的德行（人道）与基督		
本人的道（天道）	(44)	
(五) 国家理想：开明元首政治——民主政治的		
德意志形态	(47)	
二、青年马克思大学时代伦理价值观转变的三个来源或动力		(48)
(一) 父母的箴言	(49)	
1. 良心、意志与尊严	(50)	
2. 为自己开辟道路，为神圣义务铺路	(52)	
3. 天赋理应受到酬劳，天赋应使自我完美	(56)	
4. 经济学课程与卡尔式账单：青年马克思对待		
经济学与经济问题的最初态度	(59)	

(二) 浪漫诗情和文艺活动：被爱情和诗歌唤醒的 自我解放与自由个性	(62)
1. 自我画像对基督圣像的排挤：青年马克思诗情 活动中的自我中心转向	(63)
2. 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青年马克思对 自由概念的诗情阐释	(66)
3. 幻灭的诗情结局：在灵魂深处寻觅生命的 永恒之美与和谐之音	(68)
4. 否定带来的讽刺狂热：自由的人道精神对 现代科学的戏谑与挑战	(73)
(三) 寻求“事物本身的理性”：法哲学思想试验中的 “现代世界哲学”背景	(76)
1. 启蒙精神的德国思辨形式：青年马克思哲学 活动中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	(77)
2. 应有之物与实有之物的对立：“没有哲学就无法 前进”	(78)
3. 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将新的神安放进尘世的 中心	(80)
4. 诱人敌人的怀抱：建立与现代世界哲学的密切联系	(81)
三、“博士论文”中的理性自然观：一种以自我意识立论的 自由本体论	(83)
(一) 怀疑方法与表象自由：哲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在世界 创造过程中的情感与原则	(85)
(二) 哲人形象与哲学态度：哲学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及其 人格化生活历程所产生的自然伦理与知识伦理问题	(92)
(三) 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哲学—科学 活动的伦理前提与青年马克思的原子概念	(104)
(四) 原子形式规定（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实现： 原子偏斜的三个伦理结论	(108)
1. 抽象的个别性与人的自由对立	(109)
2. 先决条件悬置与人的幸福宁静	(113)
3. 原子间性与自然法—契约正义	(119)

第二章 市场化初期社会贫困问题的制度伦理批判

——有机理性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初步回答	(123)
一、《莱茵报》时期：有机理性与契约正义	(125)
(一) 自然法—契约论：“国家的有机理性”	(125)
1. 真理与道德的基本关系：真理原则作为道德原则	(127)
2. 理性主义的国家法哲学：“国家的有机理性”对 自然法—契约论的新概括	(131)
3. 国家制度构思与机构设计的伦理批判：多重国家 原则的混合与政治异化问题	(134)
(二) 社会贫困问题的制度伦理批判：作为经济伦理问题的 社会贫困	(139)
1. 习惯法与“开明的立法”：自然阶级的自然权利与 习惯权利问题上的动物法与人类法	(140)
2. 社会贫困问题的立法权批判：社会贫困是立法的 贫困	(146)
3. 社会贫困问题的行政权批判：社会贫困是治理的 贫困	(152)
二、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德法年鉴》时期：《莱茵报》 制度伦理批判的深化	(157)
(一) “应有的双重化的同一性”困境：社会本质的 二元论中的盲目的自然必然性	(158)
1. 黑格尔论述本质的逻辑学原理是偷换逻辑： 与黑格尔哲学伦理学明确划界	(159)
2. “应有的双重化的同一性”：道德哲学探索中 人道与历史双重批判视角的萌芽	(163)
3. 国家制度的非理性政治契约本质：政治异化的 历史进程与财产伦理的历史演进	(167)
(二) 现代问题的经济批判：作为经济问题的现代问题 及其人道结局	(176)
1. 人的解放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制度—权利批判向 经济批判的深入	(177)
2. 人的解放就是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原则与经济学 原则的潜在结合	(180)

第二篇 经济伦理的经济哲学批判时期
(从《巴黎手稿》到《新莱茵报》) (185)

第三章 伦理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初步融合
——“国民经济学的道德”与“道德的国民经济学” (191)

- 一、黑格尔主义哲学伦理学的经济学批判：自由本体的劳动人性论的确立 (193)
(一) 与黑格尔主义哲学伦理学再划界：“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的唯物确证 (194)
(二) 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异化劳动解读：“人的劳动本质”的经济学确证 (197)
(三) “实践的人道主义”：人的真正生命和生命表现是自主活动和自由活动 (202)
-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伦理学批判：对劳动价值论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反思 (208)
(一) 劳动价值论的实践悖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209)
(二) 劳动价值论的异化本质：“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214)
(三) 劳动价值论的历史结语：“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 (220)
- 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 (226)
(一) “国民经济学的道德”：以“生产性”伦理为中心展开的古典经济学的德性 (226)
(二) “道德的国民经济学”：以“德性”伦理为中心展开的古典经济伦理悖论 (231)
(三) 人的本质活动领域的学科异化：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问题的解决 (237)

第四章 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经济伦理问题
——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与伦理问题的经济分析 (249)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性论基础：以实践人性论为基础的经济伦理体系的确立	(251)
(一) 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的基础假设：实践人性论的知识伦理学前提	(252)
(二) 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的基本结构：实践人性论关于价值问题的经济判据	(258)
(三) 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论的价值归宿：实践人性论关于经济问题的人道判据	(264)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基础：以自由契约论为基础的经济伦理体系的确立	(271)
(一) 唯物史观契约论机制的经济界限：作为市民生活内容表现的古典功利主义	(272)
(二) 唯物史观契约论机制的经济界限：作为市民生活意志表现的古典自由主义	(281)
(三) 唯物史观契约论机制的经济界限：作为市民交往方式表现的古典社会契约论	(290)
三、唯物史观框架中的三大基础经济伦理问题：私有财产、社会贫困和共产主义	(299)
(一) 私有财产的本质与德性：作为现代经济伦理批判学理基础的私有财产	(300)
(二) 社会贫困的道义本质：作为现代经济伦理批判问题中心的社会贫困	(310)
(三) 共产主义的人道本质：作为现代经济伦理批判价值归宿的共产主义	(320)
第三篇 经济伦理的经济学批判时期 (《资本论》及其手稿)	(334)
第五章 “天赋人权的伊甸园”	
——劳动价值论与商品—货币伦理	(342)
一、市场的伦理境界：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与前定和谐	(344)
(一) 商品交换的法权关系：市场伦理的契约论框架	(345)
(二) 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德性：商品世界契约结构的基本要件	(347)

1. 商品交换价值的德性要求：等价、平等、抹杀 个性和互不关心	(348)
2. 商品使用价值的德性要求：自由、人格、个性和 互利的关心	(351)
(三) 劳动正义与市场和谐：商品世界中个人利益与公共 利益的关系	(354)
1. 商品监护人的自利本性：共同利益不过是自私 利益的一般性	(355)
2. 商品生产的社会性问题：自利追求自动实现为 社会公益的经济学机制	(359)
二、交换价值的独立化及其职能形态的分化：货币 本质与货币伦理	(363)
(一) 货币的本质与货币发生学中的伦理问题	(364)
(二) 货币的职能分化与货币各职能形态的德性：商品 德性的货币升华	(378)
(三) 货币贮藏与资本欲望：市场运转的形而上动力与 致富欲中的新教精神	(382)
三、人格介入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交换的信用契约与 市场的信任基础	(391)
(一) 商业信用的自然基础和商品交割的信用契约：作为 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德性	(391)
(二) 信用制度与信用危机（从信用主义到货币主义）： 信用问题的本体论约定	(397)
第六章 资本的失乐园	
——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伦理问题	(409)
一、价值的秘密：生产性伦理问题	(412)
(一) 生产性货币：野蛮致富与勤劳致富的争论	(413)
(二) 生产性劳动：价值增值与劳动正义论	(418)
(三) 资本的生产性：资本的道德合法性与剩余价值理论	(425)
二、生产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434)
(一) 契约伦理与工厂立法：市场原则的法律实现	(435)
(二) 资本效率的伦理批判：非人化与人道化双重趋势	(444)
结束语	(458)

参考文献	(476)
附件一	(489)
附件二	(490)
后 记	(493)

绪 言

20世纪末期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市场化浪潮，出人意料地在本世纪初期把社会主义中国推上了世界历史高度。当代中国世界历史角色的扮演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定要面对一种全新的问题域，而这个问题域的实质和核心无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该问题域的内核明确表达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实践进程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冲撞、磨合与互动所产生的物质丰裕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矛盾张力。关于该张力的这种或那种、公开或隐蔽的学术表达方式凸显出当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并强化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迫切性，这正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动力和时代背景，大变革时代要求理论作出时代回应。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实际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目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28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03页。

—

中国 30 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强化了国人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迫切需求，但短暂的市场实践史向国人清晰地表明，像几乎所有其他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一样，经济学科在当代中国仍未脱离介绍引进阶段或者说最多只能算才刚起步，“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①。虽然马克思《资本论》的引入由来已久，但长期的计划经济却使它在我国一直缺乏生存论基础，当市场实践使我们在当代开始拥有这个基础时，关于《资本论》的“过时论”却已经不绝于耳了。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资本论〉第 2 版跋》关于政治经济学在当时德国的历史境遇的精彩描述：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理解，就是说，被扭曲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拌杂，满怀希望的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来的。从 1848 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经济关系。而当这些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②

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相似，套用马克思常用的表达方式，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在当时德国第一次遭受的历史境遇上演的是“悲剧”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当然属于古典经济学范畴）在当代所遭受的类似尴尬上演的就是“喜剧”了。中国经济实践基础的历史转换及其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当代中国理论工作者忽然发现，公正地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 月第 2 版，第 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5 ~ 16 页。

待马克思显得比公正地对待西方经济理论还要艰难，尽管《资本论》本质上也属于西方经济理论。实践基础的改变对于理论研究就是这么严肃而残酷，生活本身究竟还能在多大意义上允许“不偏不倚”的研究呢？用理性的头脑来回答该问题看起来比用利益的钞票来回答该问题要显得乏力得多。对马克思来说，理论的生活回答的秘密就在于表明理论的实践依托，即看它到底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马克思始终坚持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依托：“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①

在马克思眼中，任何理论，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学科，其本身都是不自足的。理论活动的动因只能到理论活动之外去寻找，理论创造的源泉只能存在于生活实践中。然而理论的实践基础作为生活自身的实践意识，却常常因特定个体有意或无意的“超阶级”或“超阶层”幻想（因为个人总是而且必须从自己出发，^② 其生活实践本能地驱使他把自身所处阶级或阶层的实践意识夸大为整个社会或类的实践意识）而变得模糊不清且往往美其名曰“理论的公正”，借用马克思的话讲，“在没有比利用一切机会来充分享受自己的道德完善更容易的事了”^③。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马克思所喜欢的一句斯宾诺莎的格言：无知不是论据，如果每个人都把前人著作中他所不理解的地方删去，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一张白板！^④ 对一个阶级或阶层而言的公正理论，在其他阶级或阶层眼里却往往不一定公正，甚至可能荒谬。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马克思为何要把政治经济学称做“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⑤了。当代特定历史个体生活实践中滋生出的“超阶级”、“超阶层”幻想使得《资本论》的知识社会学与知识伦理学立场变得相当可疑，这自然导致其精神报偿无从谈起。马克思本人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实践意识，把“《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看作“对我的劳动的最好报酬”^⑥。

撇开理论研究的这种知识社会学与知识伦理学属性不说，仅就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理论贡献或独创成就的可能性而言，马克思在自己政治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第18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63、79、98、10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第1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4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第87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第15页。

学批判过程中为其德国同胞拟定的研究方略和指点的学术迷津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而言仍不乏其启发性或正确性：“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① 不过，在着手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之前，我们的研究者们必须首先检讨一下自己的道德勇气，看能否做到像马克思那样，把真理原则设定为一种道德原则，寻求一种自由、诚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客观研究，即使遇到生活的偏见也不退缩，这就是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在《莱茵报》时期第一次明确，在后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再度公开表达的理论品格。这种理论品格作为其知识伦理学原则立场的个性再现，在这里可集中表达为这样一点：在勇于揭示他人知识社会学立场的同时明确自己的立场。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迫切现实问题，促使国人对自身经济生活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发生浓厚兴趣并激发了国内外理论工作者全方位关注和思考当代中国经济伦理问题的空前热情，西方经济伦理思潮一拥而入，而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作为介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和尚待国内学人开垦的一片处女地，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学研究已成为经济学家与伦理学家热烈追逐的对象，它已似一门显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

综观国内经济伦理研究现状，介绍引进仍是经济伦理研究领域中的重头戏，然而其中也不乏“知识创新”的不懈努力，但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那样，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学科分工所导致的知识领域中的“学科异化”现象^②依然困扰着今天国人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表现出这一研究领域所特有的症候群：关切经济生活的伦理研究由于缺乏经济学语境支撑而激起经济学家的不满，透视道德生活的经济研究则由于缺乏哲学伦理学传统护佑而同样为哲学伦理学家所不齿，缺乏深层学理交融的硬伤使得国内经济伦理研究不得不接受和面对两个学科相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344页。

隔阂所带来的学术阵痛，经济学家与伦理学家由于相互缺乏对方的系统学理训练而使得经济伦理研究变得困难重重，国内经济伦理研究的种种尴尬正在于此。因此虽然经济伦理研究者们相当小心，但一个最有可能的结果还是经常发生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来自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双重批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早已指出过这种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曾遭遇的学科异化困境：“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①

在社会主义经济伦理问题研究中，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理所当然地居于基础、核心和根本地位，但从文献方面看，它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分散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而尚未统一于“马克思经济伦理学”名下（尽管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以马克思名义出现的经济伦理文献，但对我们的研究而言仍相当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解答现实问题的实践迫切性所引致的政策应对的时效性，使得国内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在问题及其解答方式上不能不尾随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之后，而未能完整、准确、系统、全面地反映马克思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理论内生性、理论完整性、理论彻底性和理论超前性，因为对以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学理思考方式而言，问题的提出就是对问题的解答，亦即提问方式决定问题解答方式，问题提法制约问题解答方向和解答路径，有什么样的问题提法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答案，因此只有从问题提法入手，才能发现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个性及其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实践的契合点。广义的经济伦理肇始于市场体系（市民社会）兴起引致的原则冲突和价值转型，马克思关于市场体系的伦理思考不能脱离西欧、尤其德国经济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的特殊时代语境，明确马克思在西欧现代化语境中关于市场体系的特殊提问方式，无疑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的首要问题。

那么，马克思本人究竟是如何向“市场”发问的呢？这一点在当代中国似乎被人们忽略或遗忘了。问题制约答案，语境制约问题解答路径，提问方式制约问题批判的话语系统。马克思对市场问题的提问方式无疑制约着马克思市场经济批判的整个话语系统。模糊了马克思的问题与语境，也就模糊了马克思的理论个性和时代特征，当然也就无法准确知道，在马克思的整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75页。